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中國經濟成長的結構成因與限制：一個地緣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2-H-343-005-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蔡宏政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24 日

壹、前言

一、緣起

中國自 1980 年代以來發展累積了驚人的整體經濟成就。它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以平均 7% - 9% 的速度成長至今。實際利用的國際資金達 6234 億美元，2002 年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外匯儲備於 2003 年 5 月達到 3400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其貿易量佔世界總量的比率自 1979 年的不到 1% 上升到 2003 年的 6%。而其出口商品結構從 1978 年的工業製品佔總出口的 37%，農業製品佔 63%，分別轉變為 2000 年的 90% 與 10% (Prasad 2004; 童振源 2004)。如果中國在 2025 年之前持續以 7% 的速度增長，其 GDP 將達到美國 1980 年代的水準 (Nanto, Dick K. and Radha Sinha 2000)。而伴隨著中國這樣大規模、長時間、高速度的經濟成長勢必引起國際經濟資源 (糧食、能源、工業原料) 的重分配，改變國際產業的分工秩序，以及對應這些經濟資源的重分配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與軍事之競合。

貳、研究目的

一、主要問題與假設

一般而言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解釋大多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生產要素全球化來解釋，也就是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結合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入所致。不過這一理論無法解釋為何擁有相同的廉價勞動力與廣大土地、而且也極力想吸引外資之印度為何無法依循相同的發展路徑，獲得類似的經濟成就。中國與印度的不同發展結果提醒我們，東亞地緣政治經濟的獨特性在解釋中國經濟成長上應該扮演著關鍵的意義。因此，本計畫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提供一個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論證，來分析有哪些結構性因素使中國能夠維持這樣大規模、長時間、高速度的經濟成長？

本文的分析方法是以鉅視的歷史社會學進路開始，也就是在東亞的區域規模與戰後約 50 年的長時間之架構下，去分析一定的時間序列 (temporal sequence) 中事件發生的過程與後果，並且經由這些歷史事件的排序與解讀去揭露地緣政治經濟結構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影響。同時，為了避免鉅視結構觀點易於忽略對特定國家或社會的獨特性與行動意圖，我們還需要分析中國本身在這段歷史進程中制訂了何種發展策略來面對區域轉型的變局。套用馬克思的名言，國家 (中國) 可以決定其自身的發展路徑，但只能在一定的歷史結構下做出它的決定。這種國家策略與區域結構多元的交互影響在某些歷史時刻會匯聚成為歷史進程的轉折點 (historical conjuncture)，為以後的歷史進程設下主要的發展參數。這樣的歷史轉折點就是筆者所要分析的重點。

具體而言，1985年廣場協定（the Plaza Accord）的簽署被劃定為主要的歷史分界點。在這之前，東亞的資本主義政經結構是以雁飛型秩序（flying geese order）為主。一般對於雁飛型秩序的分析架構是把它當作東亞區域的產業分工階層體系來看。筆者認為，除了這個經濟層次的分析外，其實有更重要的是設定此一區域分工階層的地緣政治因素。廣場協定的簽署直接造成日本與四小龍對外投資的趨勢，而進一步將東南亞與中國整合進入雁行秩序中。由於1990年代全球化理論的盛行，這一整合通常被解釋為雁行垂直分工秩序的解體。筆者試圖論證，「雁行垂直分工的解體」這一命題雖然在產業分工階層體系上一定程度是成立的，但是雁飛型秩序背後的地緣政治邏輯基本上仍然維持其運作上的有效性。

與雁飛型產業分工結構轉型相應而起的是中國發展策略的改變。支持中國戰後超趕發展策略的政治動力雖然一直是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然而從毛式自立更生的集體經濟到鄧小平之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發展策略的確在實踐手段上有著性質完全不同的轉變。所謂從「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邏輯是更加倚重外國投資、技術與出口市場來加速自身之發展進程，即便這種發展會以中國國內城鄉、地域及階層的不平等為代價。在某種發展限度內，這一策略類似於過去雁飛型秩序的四小龍的出口導向工業化邏輯，然而問題在中國的地緣政治位置對美國在東亞的領導權而言完全不同於四小龍或日本。中國整合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與持續累積其經濟動力勢必對區域政治經濟結構產生關鍵性的衝擊。因此，我的主要假設是，東亞地緣經濟上的轉型（廣場協定）與中國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區域不平衡的國家發展策略二者的結合是導致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然而此二者也是構成中國未來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限制條件。

叁、文獻探討

一、理論回顧

基本上，以全球／區域政經變化為主要結構動力來解釋中國經濟成長的研究進路可以分為三類：全球化理論、世界體系與大中華經濟圈。

（一）全球化理論

1990年代以來對全球規模的社會經濟變遷的顯學非全球化理論莫屬。而大前研一則是以資本主義全球化來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者。雖然大前研一因為2003年「中華聯邦」一書而在台灣為一般社會大眾所熟悉。但是他的基本觀點早在1995年的“The End of Nation-State”便已經提出。他的基本論證是無障礙的資訊全球自由流動將使消費者的消費行動是以全球為導向，而資訊技術的進步也使得全球生產之組織得以可能，從而帶動了全球性的跨國投資網絡。因此對於依舊以傳統民族－國家為單位來定義自身之國家利益者，大前研一認為他們是錯認真正的國家利益之所在，並且是自外於未來的前進的契機（Ohmae 1995: 28-42）。

對大前研一來說，持續深化中的全球化浪潮將把傳統的民族－國家轉化成為區域國家

(region state)。一個區域國家必須大到足以提供一個有最新發展的尖端產品，但必須小到足以使其公民能以消費者共享其集體利益。因應這樣的趨勢，大前研一提出了廣東、福建、香港與台灣應該合而為一成立「南中華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ern China) (Ohmae 1995: 89)。因為照大前的解釋，中國近 20 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就是在全球化趨勢下，大量外資往中國沿海地區的集中所造成的。而中國政府不但沒有改變區域及城鄉間的不平衡發展，反而「對鄉下人民實施殖民式的剝削」，因此他認為與其說中國是一個大的國家，毋寧說它早已分化成六個區域國家(加上新加坡與西藏而成為八個國家)，構成他所謂的中華聯邦(the United States of Chungwa)(大前研一 2003: 31-60, 209-235)。

大前這種所謂不可避免的 region state 趨勢，根本言之，就是一種新古典主義的全球化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由於 1980 年代通訊技術的革命性進展使得跨國投資、生產與貿易得以可能。而全球性的政治制度、社會互動甚至於文化價值都必須依循此一全球性市場的進展做相應之調整。關於這種自由市場的「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論述，學界已有頗多批評(Held 1999: 1-10)，主要之質疑即在於全球化的經濟運作與維持必須根植於一個穩定的國際政治與社會調節機制，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就越需要一個全球性的霸權架構來調節個別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準此而言，經濟全球化反映的是少數核心國家單方面影響力之擴散與國際權力階層的重構，而非如大前所言，是個別民族國家的主權與能力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在制度上全面性的衰退(Hirst and Thompson 1999; Gilpin 1987, 2000)。

因此全球化較為精確之意涵應該包含下列兩個互相關連的命題：第一、以全球為場域的跨國經濟活動(投資、生產、貿易)其密度與廣度之明顯增加；第二、這種密度與廣度明顯增加之全球經濟活動因為必須落實在一個個具體的民族國家中運作，跨國經濟活動的增強必定有著相應的(corresponding)國際政治階層的調整，因此也就涉及各民族國家如何設定各自的國家利益之問題。這種跨國的經濟體系(trans-national economical system)與國際間各主權國家(inter-national sovereign state)的衝突與競爭正是世界體系進路所一再強調的。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轉入對於世界體系的討論。

(二) 世界體系觀點

世界體系，按照華勒斯坦的定義，在概念上包含著兩部分：一是以具有明確法律疆界的政治單位如現代國家體系中的民族國家；二是這些法律上互相獨立的政治單位是由一個跨國的資本主義勞力分工體系世界經濟(world-economy)所連結在一起。各個國家在這樣的分工體系被賦予不同的經濟角色，有著不同的階級結構與勞動力控制手段，因此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與行動，它們基本上可被分成核心、半邊陲、與邊陲(Wallerstein 1974: 15, 162)。

Giovanni Arrighi 可能是按照世界體系的基本邏輯來解釋為何中國有這樣大規模、長時間、高速度經濟成長最具的代表性人物。建築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方式的產生是由「貨物—金錢—貨物」轉變成「金錢—貨物—金錢」，以及布勞岱爾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命題—「金融資本主義是每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秋天」，Arrighi 在他的「漫長的 20 世

紀」一書中論證，自現代世界體系於 16 世紀成形以來，每一個世界霸權的興衰都會符應著資本累積方式的轉變：從產業資本主義的資累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的積累。對 Arrighi 而言，1985 年的廣場協定正標誌著美國霸權自產業資本主義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秋天」，而因為廣場協定引發的 FDI 匯集到中國所導致的經濟發展正意味著中國霸權興起的初始階段 (Arrighi 1994)。簡言之，中國過去 20 年的高速度的經濟成長源自於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發展階段的轉型力量。

世界體系的觀點最常為人所批評的主要兩點，Arrighi 的理論皆不能免。一是它的解釋通常是結構主義式的，個別國家具體的發展現況經常在整體的世界經濟發展視角中被忽略不計，以致於理論的推斷常是過急推廣 (over-hasty)，從而忽略了現實中最为可能的發展路徑。Sassen (1996) 就論證，生產全球化的結果反而促進了金融控制、市場行銷管理與利潤匯集在地理上的集中，從而使全球化的經濟活動聚集於少數的全球城市 (global cities)。這種趨勢因為中國偏好沿海的不均衡發展政策而強化了以北京、上海與深圳為核心城市吸引外資的能力。沒有討論這些具體的國內因素，我們就不能瞭解同樣在廣場協定所造成的區域影響下，為何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會有不同的發展趨勢，甚至於同一個中國境內會有沿海城市與內陸鄉村的巨大差異。

其次，整個世界體系的推動力最終而言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積累方式，因此不管是國際政治、社會制度或是個別國家之發展策略都經常被化約成世界經濟的表面波濤，不具歷史意義。Skocpol 就批評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模型是「把國家機器與政策化約成為支配階級的利益所決定之事物」(Skocpol 1994: 55-71)。因此，弔詭的是，世界體系觀點與它最想要批判的對象—新古典主義的全球化理論，有著相同的主要缺陷，即對歷史發展的現象訴諸了一個反歷史 (ahistorical) 的經濟法則來解釋。如同 Polanyi 在他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所展示的，如果沒有扭曲一定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與之配合，資本主義是無法被建構與發展的。因此對於中國經濟之發展，我們還需要對它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基礎作分析才能明瞭其全貌。所以我們的探討必須再轉入另一種更細緻的鉅視歷史社會學進路，大中華經濟圈 (the Greater China Circle)。

(三) 大中華經濟圈

由於香港、台灣與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投資與貿易，尤其是與世界經濟體系的整合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使得某些的學者主張中國在 1980 年代之後的高速成長代表著一個「大中華經濟圈」的崛起。在此的「大中華經濟圈」指的並不是像 Shambaugh (1995) 一書中所討論的那樣一個組織鬆散、甚至於利益互相矛盾的海外華人集合體，而是一個明確試圖把傳統中國納貢體系 (tributary system) 理論化為一個具有獨特歷史的「東亞世界體系」。

類似於布勞岱爾對地中海的分析，這個觀點把自東北亞延伸到東南亞的海域中所包括的區域、國家與城市視為千年來具有獨特歷史，而以中國納貢體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體系」。因為在這區域中的國家與城市其距離近到可以互相影響，但又遠到無法互相兼併。這種自主性與關連性於是在政治上形成一種鬆散的整合，在經濟上則是以納貢系統為交換的網絡，形成一個「必須以亞洲海洋史來理解的區域亞洲史」(Hamashita 1997: 115;

Arrighi, Hamashita and Selden 1997)。

西洋勢力的入侵並沒有消滅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納貢體系，相反地，它們利用海外華人 (Chinese Diaspora) 做為媒介試圖把納貢體系收為己用，也因此培育了海外華人商業網絡。依循同樣的邏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則被理解為日本帝國在創造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納貢系統以取代原先之中國納貢系統。日本所遺留下來的納貢系統則在戰後由美國所建立的雁飛行階層體系取而代之，建立了以美國霸權為核心的冷戰納貢系統 (Arrighi, Hamashita and Selden 1997)。

在這樣的論證脈絡下，廣場協定所引發的自台灣、香港、甚至於新加坡或東南亞華人對中國的投資就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代表著由戰後美國霸權所培養出來的海外華人經濟網絡開始把資本引導到中國本土 (China Proper)，是一個「中國中心」¹的納貢體系在歷史上的復位 (So and Stephen 1995: 27-28; Hung and Selden 2001: 62)。這種歷史趨勢「提供了中國共產黨一個一石兩鳥的有利武器：一方面提升中國大陸的經濟，另一方面則依據一國兩制模式來進行國家統一」 (Alvin So and Stephen Chiu 1995: Chapter 11; Arrighi and Silver 1999: 267-268)。而中、港、臺的統一是值得提倡的，因為它既可以抵抗核心國家的保護主義，又可以面對邊陲地區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 (So and Stephen 1995: 264-265)。最後，「這一中華民族與中國企業的再生將會居於亞洲政治的戰略性重整之核心位置」 (Hung and Selden 2001: 74)。而大中華經濟圈的歷史揚升將會使「它比別的国家更能爭取到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力量」 (Arrighi 1999)。

雖然這個論證試圖運用具體之歷史證據為中國在 1980 年代之後的經濟躍升提出一個世界體系式的解釋。然而它的主要概念含混不清，而歷史證據則不夠堅實到足以支撐那麼大規模與長時間的歷史複雜變遷。筆者對這個理論有三個主要批評：

首先，這個理論雖然是由許多世界體系的學者所提出，但是「東亞世界體系」基本上已經不是華勒斯坦所定義的世界體系。「東亞世界體系」的政治構成單位既非民族國家，聯繫各個區域的經濟活動也不是一個依據資本主義資累方式而有的分工體系。事實上，華勒斯坦明確定義古代中華帝國為一種「世界帝國」，納貢體系主要是在一個帝國之內由上而下的經濟汲取方式，而非現代政治體系下「國際」之間的資源移轉。而納貢體系作為國與國之間的物質資源轉移的作用也頗受學者質疑 (Fairbank 1968)。沒有這種區分，古代帝國統治、日本殖民擴張與美國在戰後的全球霸權在治理機制 (governance mechanism) 與支撐此一治理機制的物質生產能力上的不同就被全然混淆在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納貢體系」中，從而喪失了理論的因果解釋能力。

第二，由於應用了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納貢體系」概念，這個試圖加入具體歷史事實的「大中華經濟圈」論證反而加重，而非減輕了，原本已經存在於世界體系觀點中的缺點。如前所述，世界體系的觀點最常為人所批評的是它的解釋通常是結構主義式的，這一

¹ 在上述諸作者的論證中，Sino-centric 與 China centered 是可以互相替用的。這是因為他們將一個前民族國家的中華帝國納貢體系用到現代的國際政治經濟階層中，這一混用就使得他們對中國民族主義與海外華人的分析充滿著想當然的假定，請見底下第二與第三點之檢要批評。

缺點所引發的另一重大缺失則是將理論應用在解釋個別國家具體的發展現況的時候經常是目的性的 (teleological) (Skocpol 1994)。「大中華經濟圈」的論證最為致命的缺點就是它忽略了 overseas Chinese 的概念的複雜性(海外中國人? 華僑? 亦或是海外華人?), 從而發明出一種東方主義式的「中華民族」論述來為目前中國的經濟成長虛構出一種長期的、中國中心的歷史根源。這種歷史虛構使他們無法看到「大中華經濟圈」內複雜的政治認同與經濟利益彼此之間的角度與拉扯。

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以前, 居住於東南亞的漢族移民通常被稱為「華商」或「華工」。由於明、清兩朝的海禁政策, 它們多半與當地人通婚, 「經由通婚或是尋求官職以提高自己家庭的社會地位, 他們最終都融入了當地的菁英社會中」(Wang 2000: 81)。只有當清朝為西方列強所迫, 從「中央之國」(the Middle-Kingdom) 轉而重新界定自己為現代國際政治體系下的一個民族國家時, 這些海外漢移民才開始被定義為「華僑」。他們開始被爭取成為清末改革或民國肇建的生力軍, 也在戰後成為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為代表中國的正當性競相爭取的對象。「華僑」的愛國形象與內涵也就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與轉折被一再界定。

然而, 與此同時, 戰後東南亞各國也紛紛從殖民地轉變成獨立的民族國家, 國族建構的必要性使東南亞國家對「華僑」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愛國者特別地警戒。其結果是多數的華僑最終選擇歸化於當地國家。即使是以漢人為主的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 新加坡人也以海外華人自稱。Overseas Chinese 因此指涉的首先是一個族群身份, 而不必然是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中「中華民族」的成員。

在政治上對 Overseas Chinese 的族群性與民族性的混淆, 以及經濟上把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分配模式通通混雜於「納貢體系」之中, 使得這種「大中華經濟圈」分析充滿目的性 (teleological) 論證。十九世紀的西方列強非但不能瓦解中國中心 (Sino-centric) 的納貢體系, 反而培養出一個「海外中國人」的商業網絡。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不能取代它, 只能培養一個戰後為美國所用的東亞殖民網絡。最後, 美國利用這個殖民網絡所創造出來的雁飛行階層體系則在廣場協定之後成為「海外中國人」為中國輸入資本的管道, 這種「歷史趨勢」則「提供了中國共產黨一個一石兩鳥的有利武器: 一方面提升中國大陸的經濟, 另一方面則依據一國兩制模式來進行國家統一」(Alvin So and Stephen Chiu 1995: Chapter 11; Arrighi and Silver 1999: 267-268)。這種歷史鋪陳是以 long duree 之名先行假定了一個先驗的歷史發展目的 (中國的躍升), 然後在圍繞著這一先驗的目的下進行歷史資料的論述。在較好的情況下, 它可以提供一個智識上的臆測 (intellectual speculation); 在最壞的情況下, 它是以學術樣貌反映著論述者的政治偏見。例如這種論述就完全忽略了 1990 年代以來中國與台灣日漸增高的政治對峙與軍事衝突的可能, 遑論觸及背後所隱含複雜政治認同問題。而正是這樣複雜的政治認同糾結才是兩岸統一問題的核心。

第三, 由於預設「大中華經濟圈」在歷史中的崛起, 現實上中國藉以吸引外資之內部不平等發展的現象則完全被忽視, 也因此完全低估城鄉、區域與階級差距對中國進一步發

展的可能限制。事實上，套用中國學者胡鞍鋼的話，中國過去 20 多年來的經濟成就已經發展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的格局。因為按照世界銀行將收入劃作四等分，上海、北京、深圳佔全中國人口的 2.2% 已經進入全球最高收入組。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佔 22% 的人口則位居第二。收入最低的中西部地區則佔全中國人口總量的一半（胡鞍鋼 2002：2-3）。可以說中國各地正以其自身之條件與世界經濟作整合，而全球化的經濟力量在實質上已經將中國切割成一個與外部世界體系相呼應之內部的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地理區塊。

二、戰後雁行秩序的形成與重塑

雁型秩序的地緣政治是以美-日結盟為主要核心的反共資本主義陣營。美國東亞戰略的最初目標是在解構日本軍國主義再次發動戰爭的能力。因此在整套的重建計畫中最主要的目標是拆除支持戰爭的財務引擎，日本財閥集團；民主化日本政治體系；以及改革日本的軍事文化。然而在 1947 到 1948 所逐漸出現的冷戰對峙急遽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畫中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社會政治改革，而是東亞的區域權力平衡。作為東亞在戰前唯一的工業國家，而且具備大東亞共榮圈所建立起來的殖民地網絡，日本因此成為「亞洲馬歇爾計畫」的首選結盟者以防堵共產勢力的蔓延。整個日本重建計畫被逆轉其先前方向。戰前的財閥集團被重新組織起來，財經技術官僚與政治菁英也繼續被保留在戰後的權力階層中（Selden 1997）。透過韓戰的軍需採購，美元被大量地輸入日本。日本則透過戰前殖民地網絡，自東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取得農工原料並回輸工業製品以平衡其美元短缺。²

雁行理論在後來的日本學者如 Saburo Okita 和 Kojima Kiyoshi 的手中就被進一步地建構成根據“比較利益法則”理性而且互惠地形成的區域分工模式。Kojima 就如此分別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與歐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他論證道，歐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是在控制投資國的國內市場，並從而獲取其獨佔利益，歐美投資國因此是以傷害地主國的國家利益來擴大自身之出口。至於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則是發展導向：

地主國擁有的潛在比較利益之所以無法實現，乃是因為欠缺技術、資本與管理能力。（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將會幫助地主國實現它的潛在利益，並因此地主國的這些新產業得以發展成出口產業。同時，由於產業的轉移至國外，日本就能將資本與勞動力用於發展具有新的比較利益的產業。因此國內的結構調整就可以展開。比起沒有日本直接投資的情形，如此和諧地擴大之雙邊的貿易是更具互補性與更高的利潤，而日本與在地國的產業結構也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改善。（Kojima 1986: 68）

在 1980 年代以日本為首的發展國家模型（state-led development model）像今日的全球化理論一般佔據著主流論述的地位時，台灣與韓國則是被認為成功地複製了日本模式

² Borden 提供了一個清楚而明確的統計說明了亞洲市場對早期日本復甦的重要性，請見 Borden 1984: 228。

發展而來的後進者 (late comers)。東北亞的發展成就也就成為支持雁行發展模式 (flying geese model) 的堅實基礎。在這個模式中，日本由於其資本與科技的優越性成為產品創新的區域源頭，不言而喻地也就攫取商品鏈 (commodity chains) 中附加價值最高的一部份。根據資本與技術密集程度及附加價值的獲取能力，日本依次將生產技術以國外直接投資 (FDI) 傳給第二梯隊的台灣、韓國、新加坡與香港，第三梯隊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後來第四梯隊的中國與越南。因此，一個“理念型”的雁飛行發展都是圍繞在以日本為首所垂直整合的區域製造網絡，以確保日本在東亞地區發展上的領導權。

然而，日本的區域經濟霸權並不是自我充足的 (self-sufficient)。如前所述，日本作為戰後美國在東亞的主要結盟者，其區域霸權地位最終還得視美國的東亞政策而定。Cumings 是首先揭露這個雁行秩序背後的美國霸權統制機制者。他指出，韓戰之後的美國東亞政策是透過日本戰前的殖民地網絡，藉由復興日本經濟來重塑東亞區域經濟，但卻保持該區域在政治與軍事上對美國的高度依賴。在這個“大新月彎 (the great crescent)”裡，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被轉化成“半主權國家”。他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日漸繁榮，但卻不具有外交與軍事上的獨立地位。雖然處於同一區域，但是互相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他們各自的對美關係而來，整個區域的發展方向最終是受制於美國的單邊影響力。

在戰後美國的例子中，霸權意味著一個“大區域”的劃定。在此區域裡的所有國家被導向華盛頓而非莫斯科的方向上去。這些國家被規制在一個具有經濟與政治偏好的階層體系中，其理想的方向是自由貿易、開放體系與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政治，但也包括重商主義國家與威權政體。對於能夠分享西方傳統或接近美式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國家，美國的處理方式可以從典型的談判到收買，至於其他邊陲或第三世界國家，美國則以戰爭或干預為之。(Cumings 1987: 49)

霸權的「政策」通常是由劃定一個外在的範圍以規制範圍內的國家所建立起來的，這個規制範圍必須寬廣到足以讓有能力者往上升，否則整個系統將因兩極化而不能持續，不過它也必須強固到足以防止整體發展方向脫離其統治領域之外。(Cumings, 1997: 137)

換言之，雖然美國霸權統治最終仍須依靠武力 (coercive power) 以貫徹其意志，但其有效統治首重設定發展的參數使各國「自由地」活動於它所劃定的範圍內而不逸離其基本的權力階層體系。因此，這種統治機制首在於說服被統治者相信，被統治者之所以願意遵守其權力階層，乃是因為在此權力階層體系中被統治者是能自由地作自己的選擇，而且能夠從選擇中獲得自己的利益。Cumings 的主要貢獻正是在指出，雁飛發展模型其實是美國霸權為戰後東亞資本主義國家所設定的發展參數。

美國戰後霸權的經濟引擎是以一個穩定的美元 - 黃金比例而構成的 Bretton Woods System。這種美元 - 黃金本位當然不是一種憑空的創制。在 1947 年美國擁有全球貨幣黃金存量的 70% (Walters 1992: 73)。因此，戰後全球經濟要持續運轉必須有賴於美國黃金以美元的方式持續地輸出。所以，即使美國在 1945 年佔有全球經濟輸出的三分之一，美國仍然需要保持國際收支赤字以便輸出全球經濟運轉所需要資本 (Rapley 1996: 35)。作為全

球金融體系的基準，美國並不能如同其他國家一般藉由調整匯率來增強其國際貿易競爭力。然而，美國卻享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有利之處。只要其他各國對美金保持信心，美國就可以藉由單純地印製美金來維持或甚於擴大其購買力。這種特殊的資本輸出能量再加上遙遙領先的工業製造能力共同支撐了美國在戰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構中的干預能力。在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中，美國藉由輸出资本與技術來啟動戰後西歐的經濟重建。為了清償美援，西歐諸國則出口其工業製品到他們戰前的殖民地。這些戰前的殖民地則輸出工農業原料到美國以完成整個資本循環，而日本則是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結盟的主要對象。

整個 Bretton Woods System 雖然維持了國際金融穩定與國家發展的平衡，然而這個體系的運作卻必須立基於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這明顯地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理論上來講，只要世界各國繼續保持對美金的信心，那麼 BWS 的黃金-美元本位就可以持續運作。但是實際上由於美國發行的美金數量如此之多，以致於在 1971 年海外美金的數目已經超過美國黃金存量的 300% (Walters 1992: 75)。這意味著只要少數國家握有三分之一的美金就足以換取美國所有的黃金儲備。為了維持美國的政治與經濟自主性，美國總統尼克森遂於 1971 年宣布切斷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然而，美元危機並沒有因此減緩。光以歐洲美元（流通於歐洲貨幣市場的美金）而言就從 1960 年的 30 億增加到 1970 年的 75 億，並在 1984 年躍升到一兆元。整體海外資本市場則從 1973 年的 3150 億美元增加到 1982 年的 20550 億美元 (McMichael 2000: 115-117; Held et al. 1999: 202; Arrighi 1994: 312)。換言之，Bretton Woods System 固然支撐了美國的霸權，但是另一方面，從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它也產生了美元信用過度擴張的危機，以及更為浮動多變、難以為個別國家所控制的資本跨國流動 (transnational capital flow)。這種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就成為 90 年代全球化浪潮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除了金融全球化的轉變外，戰後美國的工業能力優勢相對於它所援助的西歐與日本及其區域內的雁子們也呈現差距縮短的現象。底下我便以東亞電子業的發展為例作一個扼要的說明。

戰後日本電子業的發展首先得力於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早在 1953 年日本的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就設定了 30% 的高關稅來保護國內生產的電視接收器。其次，美援、美國的技術引入及美國的市場則提供了日本發展其電子業的絕佳機會。當時美國的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就是日本最重要的技術來源 (Baranson 1980: 31-32, 46-52)。直到 1960 年代中期，日本電視仍然掛美國的品牌銷往美國。美國公司當時主要是集中資源在電腦產業上，尤其是主機電腦 (mainframe computer) 的競爭。至於技術與利潤較低的消費性電子零件則依靠日本的供應。日本因此得以在這代工過程中快速地提高其製造能力，而 Keiretsu 垂直整合的生產組織及日本國家領導的發展策略更使得美國廠商到了 1980 年代幾乎在消費性電子產品上消失 (Derick and Kraemer 1998: 41-46)。美國而對日本零件的依賴還進一步延伸到工業用晶片、LCDs 及其他精密零件。正是在這樣的發展基礎上，日本政府也開始設立保護性關稅以阻延 IBM System/360 的進入及要求 IBM 以較低的權利金釋出專利權。對內，MITI 則設定保護期限，而且受保護的國內市場只留給表現最優秀的廠商。到了八零年代初期，日本在主機電腦上就迅速地接

近美國的技術水準。這種追趕壓力使得美國不得不加強其他替代生產網絡以減緩日本的競爭壓力，台灣、南韓、新加坡等「第二梯隊的雁子們」就成了美國的理想對象，而日本也不能不跟進以維持成本優勢 (Borrus 2000: 67-68)。台灣正式在美日競合這樣的脈絡下在七零年代以前建立了早期電子工業的製造能力，從而有 1980 年代的轉型，最終在 1990 年代於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戰後日本與「第二梯隊雁子們」的發展成就的確令人矚目，然而，這個發展「奇蹟」是建立在美國的資本與技術輸入以及美國的市場對這些東亞盟友的開放上，³其實也就是在先前所分析的「美國霸權」所定下的軌道中運行的結果。不過，逐漸地這個美國霸權所立基的 BWS 對美國產生了無法持續發展下去的巨大國際收支不平衡，另一方面，這個美國霸權所需要及挹注的區域強權則逐漸強大到其整體發展不見得能被美國規制於其統治領域之內。於是隨著 Bretton Woods System 的傾頹、美元危機的加深、以及美國貿易赤字的持續增長，美國的霸權統治越來越需要結構性的調整以符合新的情況。這就是 1985 年廣場協定 (the Plaza Accord) 的政治經濟學理由。

在廣場協定中，美國施壓東亞各國大幅度升值其貨幣以減輕其債務壓力，並重整其出口工業能力。然而這一因應美國霸權危機的升值行動卻引發了東亞區域一波波由上往下的對外投資流動。到 1989 年為止，日本相較於廣場協定簽訂之前對南韓與馬來西亞增加五倍的 FDI，對新加坡增加六倍，對香港增加 15 倍，對泰國則增加了 25 倍 (Pempel 1999: 67)。正是在這樣的區域變動下，南韓的 FDI 也增加了 56.4%，香港則佔有所有中國外資的 30%，而台灣則從 1987 年之後大幅增加了對東南亞五國的投資 (顧長永 2000: 172, 194)。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台灣資本更大幅投向中國，單以 1996 年而論，台灣對中國就投資了所有外資總額的三分之一 (Palat 2001, 4475)。由於這種 FDI 的成因一開始是第一與第二梯隊的雁子們的勞力密集產業無法承受升值所帶來的成本上升而尋求海外生產基地，因此這種投資遂帶動了被投資國對投資國原物料與資本財的需求，導致了亞洲區域內貿易額的增加，表現為某些學者強調的亞洲區域化 (Kwan 1994)。

廣場協定所驅動的 FDI 對東南亞在 1990 年代的景氣繁榮起到了一定的關鍵作用。然而由於東南亞地區在世界貿易上與中國有著類似的出口商品類別，1994 年的人民幣貶值及後來中國外資依賴、出口導向經濟的持續成長就對東南亞地區同樣的成長模式造成關鍵性的限制。這種成長的限制構成了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形成背景之一。而金融風暴的直接後果又導致了東亞 FDI 往中國的集中，進一步加強中國外資依賴、出口導向經濟的成長趨勢。因此，經由這一波國際金融重整以及其他各國國內的因素，⁴以美國霸權為核心的亞洲生產網絡經由這次的國際金融與產業分工重整擴大了它的領域，進一步延伸到冷戰時期不在資本主義陣營的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從而構築了東亞全球化的主要面貌。

³截至 1999 年為止，美國市場佔該國總出口的比例為，日本 30%，香港 23%，韓國 22%，新加坡 19%，台灣 26%，馬來西亞 21%，泰國 21%，印尼 15%，中國 18% (Pempel 1999: 17)。

⁴我們並不能由國際金融的重整機械地推論以美國為主導的亞洲生產網絡就因此進一步地整合了先前不在此體系中的東南亞及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如何整合進入這一新的區域分工網絡其實有其各自的政經脈絡，需要對個別國家進行相關的案例研究來釐清，如同筆者即將在底下對中國所作的分析。在這裡我所要論證的是，區域金融的重整是構成了區域生產網絡重組的支配性因素 (dominant factor)。

肆、研究方法

一、世界體系概念架構分析

為了保存前述三種解釋中國經濟成長研究進路的優點而避免其缺失，本研究採用一種修正後的世界體系概念架構來回答中國大規模、長時間、高速度之成長何以可能。筆者使用世界體系概念架構來分析核心國家（美國）為了解決自身之貿易赤字與出口競爭力而強力推動東亞各國的匯率重整，而這一匯率重整遂帶動東亞一波波資本流動與產業分工重整。正是在這種大規模的區域經濟結構重整才使的中國的大規模、長時間、高速度之成長成為可能。我們在此避免了單純訴諸一個自律市場的價格機制來解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新古典主義盲點。

二、中程範圍的論證

然而為了避免世界體系由上而下的結構功能主義式解釋之缺點，筆者認為分析中國面對此一區域變局所採取的由下而上的對應發展策略是整個論證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工作。而其作法就是去辨認出全球/區域的結構性因素與中國在地的回應如何在某一具體的歷史時程中相互作用，形成一種足以設定下一歷史發展的結構限制。1985年的廣場協定與1980年代後期的中國區域不平等發展策略正是構成這種歷史多重因素之匯聚的轉捩點（historical conjuncture），因而成為本文的分析重點。我們不試圖去提出數百年的世界體系解釋如華勒斯坦的分析或「大中華經濟圈」的論證，而是集中於較小的分析範圍及歷史時程。筆者認為這種較為「中程範圍」（middle range）的論證將更有助於澄清問題的具體討論以及相關研究議題的後續開展。

伍、結果與討論

一、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整合

不管是在投資、工業產值、出口創匯、稅收或就業，外資在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童振源 2004：38-41）。對外資之進入中國的最通常解釋是依循新古典經濟理路，亦即資本家進行不同生產要素的跨國組合（資本跨國尋找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以求利潤之極大化。然而，從毛式的集體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廉價的土地、技術熟練的勞動力、良好的基礎建設與相應的制度配合並不是依循市場經濟的運作來分佈的。在這個環節上，我們需要一個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來解釋何以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國投資會集中在沿海都會地區。因此，廣場協定與東亞金融風暴雖然構成了外資湧入中國的外部條件，但是中國如何利用這一區域分工轉型來加速自身的經濟成長則有賴於中國自身的國家發展策略。

作為一個大型但發展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國採取重工業化的進口替代策略在戰後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及部分東南亞國家中同屬於興盛中的主流思想。事實上，進口替代策略也的確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幾個著名的例子如巴西的製造業 GDP 從 1950 年到 1978 年擴大了十倍 (Gwynne and Key 1999: 72)；墨西哥在 1970 年之前的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 6.5%；印度的 GDP 在 1951-1956 間成長了 18%，在前三個五年計畫中，鋼鐵產量則增長了六倍 (Rapley 1996: 33)。就中國而言，其成就則更為突出。在人口年增率為 2.4% 的情況下，國民所得在第一個五年計畫 (1952-1957) 中依然達到 8.9% 的年平均成長率，亦即每 11 年國民所得達到倍增，其中農業產出與工業產出分別以 3.8% 與 18.7% 的速度增長，農民與城市工人實際收入分別提高了 20% 與 30% (Lardy 1987: 155-156)。

這種重工業化的進口替代策略在毛澤東草根性的語言中被稱為「兩條腿走路」。它的最高目標是在不依賴外力的情況下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做為國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它的「第一條腿」首先是盡可能地提高農業剩餘的積累比率，然後將此農業剩餘轉移至工業部門，形成一個後進農業國家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當國家工業能力建立起來之後，工業部門則轉而提供農業機械化所需之工業動力，從而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力，形成國家發展的「第二條腿」。這種發展邏輯的首要關鍵點在於農業資源的高度汲取，一方面對農業部門的投資被壓縮，另一方面農業產出又必須擔負著工業資本形成的重擔。中國農業發展的困難在五年計畫的後半期逐漸浮現，1953 年糧食產量計畫增長率為 9%，實際增長僅為 2.5%。1954 年計畫增長率為 9% 以上，糧食增長率持續下降為 1.6% (Lardy 1987: 161-162)。

然而，為了貫徹高速的重工業化策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階層相信，透過進一步的經濟集體化可以加速農業的積累，維持計畫中「兩條腿走路」的速度。首先，「統購統銷」政策在 1953 年被實施用來加強國家對農業部門的汲取，國家以低於市場價格強制收購農民的糧食，並且對私人糧食交易進行管制，乃至於將它們轉換為國家糧食徵購的機制之一。顯而易見地，統購統銷要能夠真正有效地實行，傳統的農業個別家戶生產系統必須被拆解，以便依照集體化原則被重新構作，並使之配置於國家機器的調控之下。逐漸地，從互助組到生產合作社，從高級生產合作社到最終的人民公社，傳統中國農業以家戶為生產及核算單位的組織模式被快速轉化，個別家庭之土地、耕畜等生產工具被併入集體單位之中，勞動報酬之支付也是以集體產量為基礎。

這種工業化優先的發展策略使得農業部門處於被高度剝削的狀態。在一五計畫中，中國政府汲取了國民所得的 24%，⁵ 其中只有 15% 的國家投資進到了當時人口佔 80% 的農業部門 (Selden 1993: 76-77)。從 1952 年到 1970 年代末期，城市工人雖然由五百萬增加到五千萬，然而每個工人所能使用的固定資產設備依然從三千元人民幣上升到九千。相對地，1970 年代末期每位農村勞動力只能使用到三十元人民幣的固定資產設備。在工資方面，從 195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末期，農工收入差異從 1:2.2 上升到 1:4-6。這還不包括城市工人所能享受的住房與食物津貼、免費醫療服務、終身雇用與高達薪資 70% 到 80% 的退休金 (Selden 1993: 167-170)。城市／農村的平等還延伸到教育體系，國家負擔了城市學校全部的經

⁵ 據 Naughton 的估算，相較於 1930 年代的國民政府只能汲取 GNP 的 4% 支援其預算體系，在 1954 年的中共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已經達到 30%。

費，而鄉村只能得到極為有限的補助。這一不平等在 2002 年的教育經費分配上依然沒有結構性的轉變，全年 5,800 多億人民幣的教育預算只有 23% 投資於人口佔三分之二的農村地區（陸學藝 2004：18）。

農工部門的明顯不平等自然形成了城市對農村勞動人口的吸引力，不過這就破壞了「以農補工」的基本運作邏輯。於是早在 1953 年，周恩來就下達防止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 年一個全國性的管制系統就被建立起來以防止鄉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動，這一城鄉人口隔離政策的戶口制度最終則在 1958 年正式立法通過。Selden 簡潔又深入地指出這個戶口制度是如何地與其他制度設計互相配合而對中國人民進行了全面而嚴密的政治與社會控制。

精密的配給機制限制了城市居民的食物購買、工作及住房條件，經由連結這一配給機制，戶口制度凍結而且定型化每個人的部門位置。大部分人的居住與工作被限制在他們鄉村的出生地，或就婦女而言，她們先生的出生地。戶口制度形構了一個全國性的位置階層體系，其中北京、上海與天津位居頂層，次大的省轄市居中，而最貧窮的農村地區則處於底層。與此對應而相連結的是為不同職業所建立起來的 24 級或更多的國有部門階層，包括工業工人（八級）、國家幹部（26 級）、大學教師（32 級）。

實施戶口制度的結果影響深遠而且多面。它幾乎完全地阻斷了鄉村居民獲取城市身份與國有部門工作及其福利的流動，它甚至也同樣地控制了傳統找尋季節工作或行起的人口流動。有些國外的訪客注意到，至少在 1980 年代晚期，中國的城市並沒有出現大量被邊緣化、失業、無家可歸的工人以及不斷增生、依靠低下工作、行乞、或犯罪而活的人們。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在一個動員集體主義的年代，嚴重的貧窮與飢荒是被有效地限制在農村邊緣地區。…戶口制度以及國家對工作、住房、配給與旅行相對應的管制使得城鄉與鄉村內收入及機會的持續不平等成為可能。（Selden 1993: 174-175）

因此，整個毛式工業化優先的發展策略最終的結果並沒有完成「兩條腿走路」的農工互助循環，實際上是一條腿萎縮，而另一條腿則逐漸腫大而邁不開腳步。雖然從 1951 年到 1980 年工業與農業產出以年成長率 8.6% 的速度增長，但是光是工業固定資本的投入每年就成長 11.7%。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每單位之勞動力與資本所產出的價值）實際上是以年平均 2.75% 的速度在下降。毛式的集體化經濟成了「自我消耗的成長」（self-consuming growth）（Shirk 1993: 27）。儘管毛主席的權威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之後依然無可挑戰，毛式的集體化經注定不可能被維持長久下去。

中國的改革開放通常被認定是自 1978 的中共三中全會開始。不過當時的「改革」是相對於華國鋒擴大重工業化路線所提出來的十年計畫而言的。華國鋒的十年計畫有著許多超現實的狂想，例如為了籌措進口工業設備與技術所需的資金，該計畫號召開發十個大慶油田，以便在 1985 年輸出與沙烏地阿拉伯等量的石油。最妙的是，「規劃者甚至於還不曉得新油田在哪兒」(Perkins 1991: 496; Naughton 1995: 71-73)。這個「洋躍進」計畫導致了 1978 年的經濟危機，從而使得鄧小平與陳雲的改革計畫伴隨著他們在政治上的奪權而展開。陳雲將十年計畫的重工業投資成長率降低到 7.9%，低於輕工業的 8.3%。節餘下來的資源則投入農業部門及生產消費財。家庭承包責任制便是在這樣的改革分為下被高層政治所允許而蔓延開來。

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家庭承包責任制確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一方面，國家為改善農業部門的生產力而提高了穀物收購價格，另一方面回到傳統以家戶為勞動及核算單位的生產方式則重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農民之間因為生產與經營能力的差異而出現財富積累的分化。部分農戶因此由種植、養殖業和簡單的手工業進步到加工業、運輸業與商業，逐漸上升為專業經營的「萬元戶」，形成一個戰後新的經濟階層。然而這一農業生產力提高也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方面就國家稅收的比例而言，農業副產品的產出已經由 1978 年的 4.5% 升高到 1984 年的 20%。然而這比例變化也意味著國家收購農產品的財政負擔急遽加大。另一方面，生產力的提高則增加了農村剩餘的勞動力，這就加重了農村多餘人口的問題，挑戰了戶口制度的可運作性。對於第一個現象，政府為避免因為收購農產品而持續擴大對農業部門的補助，便經由「倒三七」政策削減對農業部門的投資。至於第二個現象，政府則允許「鄉鎮企業」的建立以期藉由「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作用達到將農村多餘勞動力繼續羈留於農村地區。

鄉鎮企業的出現並不是在主持經改的中國領導階層計畫之中，⁶這其實是不難理解的。當時中國的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與工業主力仍然在於吸收農工資本轉移後的都市國有工業部門。然而，中國的國營企業體系是一個個自足的「單位」⁷聚集而成的集合體，彼此之間缺乏前蘇聯計畫經濟的協調能力。⁸一個全面性的國企改革所必須牽涉到稅收、價格、國家財政與金融問題根本就不在中國政府的國家能力範圍內。沿用承包責任制的核心概念，亦即「包產」(contracting relationship)，因而成為中國經改的唯一「制度記憶」，⁹提供領導階層如何摸著石頭過河地進行經改實驗的制度與行動線索。

趙紫陽在四川省所提倡的「利潤留成」即是體現了此一原則。與農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類似，企業被允許以市場價格出售超過國家指定的產量之上的產品，並保有這額外收入

⁶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鄧小平的告白：「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異軍突起」(Ma 1994: 2)。

⁷對中國「單位」之研究，請見 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E. Sharpe.

⁸有些學者強調，正是這種低度的組織協調能力才使得發展型地方政府 (developmental local state) 的能力得以成為中國經改成功的致勝關鍵，請見甘陽，1997，《中國改革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

⁹關於制度記憶對中國市場改革的影響，請見 Wang, Hui. 1994. *The Gradual Revoluti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Movement*.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的一部份。從 1979 到 1980 短短一年之間，實施利潤留成的國營企業已經到達全國的 16%，它們創造了全國工業產出的 60% 以及國營企業利潤的 70% (Shirk 1993: 202)。然而對國家財政甚至於整體經改而言，單一的利潤留成政策並不是一個好的主意。因為欠缺配套的價格改革，投入的原物料如煤、鋼鐵、石油其價格都還是由國家管制來決定。因此個別企業之利潤並不取決於它的經營能力或生產效率，而是企業經營者爭取國家預算投入的能力，這就造成了國營企業「軟預算」的問題，從而在整體上削減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或是增加了國有銀行的壞帳比例。根據國務院的官方數據顯示，1987 年到 1995 年之間，國有資產以每年 330 到 500 億的速度流失中，另外一些研究則顯示，從 1982 到 1992 年間，國有資產總共流失了 5,000 億人民幣，以 1992 年的價格而言，這相當於中國整個國有資產的五分之一 (Tsai 2003: 332)。

中國國有銀行的兩個主要任務是透過政策貸款支援「支柱產業」與虧損的國營企業。根據官方的數據顯示，整體國營企業的資產淨值從 1989 年的 45% 下降到 1995 年的 15%，這意味著國營企業的債務與資產淨值的比例 (debt-to-equity ratio) 高達驚人的 567%

(85/15)¹⁰。然而，裁減員工以提升效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光是以退休準備金而言，其額度就超過中國 GDP 的一半。世界銀行稱此為中國的「退休金危機 (pension crisis)」(Lardy 1998: 39-44)。因為要負責支援國營企業的虧損，根據接近國際標準的估算，中國四大銀行所累積的不良貸款總額佔總貸款比例 (non-performing loans) 已經到達 28%，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地區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平均值 (15%) (Lardy 1998: 116-117; Xu 2001: 78-79; 童振源 2004)。

因此，就中國國內而言，整個改革開放的主要動力是來自於集體企業與私有部門。而鄉鎮企業的興起的確在 1980 年代後半葉扮演著推動中國經濟的重要角色。自 1985 年到 1992 年，鄉鎮企業總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由 16.6% 增加一倍到 32.2%；上交的國家稅金佔國家稅收比例更由 6.7% 上升到 20.3%；吸收的農村勞動力由 18.8% 增加為 24.2%。然而，鄉鎮企業的分佈卻有著明顯的區域偏差。以 1987 年為例，77% 的鄉鎮企業與私營企業集中於沿海都會的周邊，佔了當時 87% 非國有部門產出。以 1988 年為例，沿海的三個省分雖然只佔全國 17% 的農業人口，卻有超過半數的鄉鎮企業工業產出。其中有 60% 到 80% 的產出來自於都市大工廠的轉包 (Naughton 1995: 154-155; Perkins 1990)。

鄉鎮企業集中於沿海表明了外貿與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幾個關鍵性數字可以簡單地表現這一特色。首先，伴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是外貿比例的增加。貿易對 GDP 比例從 1978 年的 9% 上升到 1990 年後期的 35%-40% (Ma 2000: 119)。對一個大國而言，這個比例是明顯偏高，它表明了中國作為一個技術後進者在現階段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是依賴 (dependency) 大於互賴 (interdependence)。第二，隨著貿易對 GDP 比例的提高，加工出口所佔的比值也穩定地從 1991 的 32.4% 上升到 1998 的 57%。加工品輸入也達到 42.6% (Lardy 2002: 38)。這種「兩頭在外」的生產模式說明了中國在全球生產鍊上比重日益增加的世界加工廠位置。第三，外資企業出口佔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 1993 年的

¹⁰ 一個著名的國際參照點是韓國的 chaebol，即使是以高度財務槓桿為世所注目，chaebol 的負債資產比也只是在 300% 到 400% 之間。

27.5%上升到 2002 年的 52.2% (童振源 2004: 40)。這顯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賴關係甚至於還必須透過外資企業來運作。¹¹顯然，鄉鎮企業的亮麗表現所反映的不是中國農村的工業化，而是中國發展中對外依賴的表徵。

就吸收 FDI 而言，這一沿海發展優先的經濟大戰略的確有其正確性。沿海地區有地理上的優勢，它與外國的經貿往來歷史至少可以溯源到晚清時期的通商口岸以及 1931 年以後的滿州國。伴隨著帝國主義的進入而由外國資本佔有大部分的現代工業部門因此在沿海都會區累積了較優良的基礎建設與大量的熟練工人 (Feuerwerker 1983: 58-59)。然而，除了這些傳統的優點外，1980 年代的區域不均衡發展明顯地受到國家政策深刻的影響。1980 年中國在深圳與廈門成立了四個經濟特區，給與租稅優惠與組織行政的配合，開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84 年之後，這一沿海開放都市的模式被進一步擴大到沿海十四個城市。從 1984 到 1993，更多各類的經濟技術發展特區紛紛被設立起來。為了吸引外資，它們被賦予投資與土地開發的審批權與稅率優惠，並且被允許保有一定份額的外匯以供企業營運。更重要的是，國家在這一時期推出一個明確偏好東南沿海地區的七五計畫 (1985-1990)。王紹光與胡鞍鋼如此論斷七五計畫對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

第一次，政府將中國劃分為三個區域：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根據這一計畫，在 20 世紀剩下的時間裡，投資的優先將被放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必須投資於能源與原料的生產以便支援沿海的發展。至於西部地區，它的發展則必須被推遲，至少是暫時被推遲了。(Wang and Hu 1999: 179)

一個驚人的數字是，從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沿海地區總共吸收了 85% 的國外直接投資 (FDI)，而僅僅 1% 流向了西部地區 (Wei 2000: 89)。而且因為爭取外資需要提升當地之水電基礎建設、土地開發、提供優惠稅率，甚至於擴大市場規模，在 1990 年代早期，除了上海之外，已經沒有一個省分對其他省分輸出资本超過該省 GDP 的百分之十以上 (Wang and Hu 1999: 143-165)。

這種區域不均衡的發展方式事實上產生了一個內部的雁飛型秩序。67% 的農村人口加上國企下崗工人為沿海大都會提供吸引外資的廉價勞動力，而不斷投入的外資卻也提升了人均 GDP 及購買力，從而創造了國外投資者期待的巨大中國市場。因此雖然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貧困人口逐漸下降，但是在中國往市場經濟作更進一步的轉化時，區域的不均衡卻直接造成嚴重的區域 / 城鄉間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現象。在 1.61 億貧困人口中，99% 生活在農村，而且大多集中於西部地區，特別是西藏 (貧困人口比例 20.6%)、青海 (12.6%)、寧夏 (9.6%)、貴州 (9.0%)，相較之下，江蘇為 0.4%，福建為 0.3%，廣東為 0.1%，上海

¹¹ 鄭陸霖在一個運動鞋全球商品鍊的詳細案例中指出，事實上正因為台灣的出口業者能夠跟中國當地環境保持一種「去鑲嵌化 (dis-embedness)」的關係，才能成功地將中國廉價勞動力整合入全球生產鍊之中 (鄭陸霖 1999)。

的數字則最為戲劇性，為 0.0%（世界銀行 2003：29）。對於 1990 年代以來沿海與內陸、城市與鄉村的發展差距跟國外投資的關係，世界銀行提供了一個簡要但清楚的說明：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使中國沿海地區在技術和出口方面的競爭力大大增強，而中西部地區由於受到經濟集約化程度低、缺乏計數與運輸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但是，由於來自進口的競爭壓力加大以及需求結構的變化，鄉鎮企業的發展失去動力。因此，農村地區難以提供新的非農就業機會，農業剩餘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也不足以通過降低農業生產的人地比例，從而來提高農業的收益率（世界銀行 2003：2）。

這一個資本集中與不平等分配加劇的走向其實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脈絡正是一個全球資本主義運作邏輯被逐漸在地化的過程。整個中國經改的主要特徵是集體與私有部門的持續壯大，對應著國營企業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而集體與私有部門的迅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則來自於外資引導的出口成長。在這場競逐外資以求發展的洪流中，國家帶頭將資本集中於沿海都會地區以製造更優良的投資熱點。因此，當廣場協定所引發的區域投資熱潮尋求其出口時，中國政府則選擇了「發展優先於平等」的資本集中政策來捕捉這一區域投資與分工重整所提供的機會。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的根本底蘊是在改變自身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以配合資本主義長期發展下資本集中的趨勢，它沒有什麼「具有中國特色」的神奇之處，更不是什麼「傳統中國中心納貢體系」的歷史趨勢。

二、雁行秩序的變與不變

在這篇論文中，筆者論證中國過去近 20 年來的長時期、大規模、高速度的經濟成長主要是受到兩個因素交互的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與中國發展策略的改變。在這樣的分析基礎上，我們就可以將「雁飛型發展秩序是否解體」以及「中國崛起」這兩個議題結合在一起，提供一個初步但具有綜合性與啟發性的討論方向。

就東亞區域的產業分工階層體系這一層次而言，雁飛型發展秩序的確在廣場協定之後產生了質變。首先是冷戰時期不在東亞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都或早或晚地被納入了資本主義式的全球生產網絡之中。而更自由的資本與技術跨國流動與資訊的數位傳播相互呼應，導致生產分工的垂直分化，而非垂直整合。後進者可以集中資源於某一領域，在技術更新日益垂直分化的過程中，致力於發展某一領域的領先地位，獲取全球市場上的利基。¹²後進者如今並不必然需要依循舊有的雁型分工階層往上爬升。

¹² 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台積電的「專業晶圓代工」模式。有關台灣電子業的技術輸入、擴散與創新的制度與組織研究，請見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北：群學。關於台灣作為後進國家的產業升級策略的精彩分析，請見瞿宛文、安士敦，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北：聯經。

然而，如同前面所分析的，雁飛型發展秩序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背後的地緣政治經濟結構因素，它其實是一組以美國霸權為核心的區域發展參數。正是美國為求扭轉其赤字與貿易劣勢才有廣場協定的簽署，進而引發了東亞區域內（intra-regional）投資與貿易規模的上升。就這點而言，中國之被整合進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依然是通過一個受美國霸權支配的東亞分工體系來進行的。誠然，中國出口到各個已開發國家的份額都呈現驚人的成長。自1980到2003年，日本自中國之進口佔日本全部進口比例從3.1%上升到18.5%，美國則從0.5%上升到12.5%，歐盟則是從0.7%上升到8.9%。然而，自歐美國家賺得的大量順差尚不足以彌補對日本、韓國、台灣的逆差，而且其差距隨著經濟成長而成長（Prasad 2004: 5, 10）。顯然，在全球生產分工上，中國主要從事的工作仍然只是低階的國際加工與裝配。是過往日本出口資本財、台韓加工、美國進口這一三角貿易的延伸。事實上，即使在高速經濟成長20年後，中國在1999年的GNP總額也只佔當今西方核心國家¹³的2.9%，這個比例實際上還遠低於1938年國民政府主政時期的8.2%（Palat 2002）。「中國崛起」這一命題如果指涉的是相對於改革前落後狀態的進步幅度，那將會比較有意義。如果它的意涵是挑戰甚或取代美國霸權所需的物質基礎，那麼對比於美國取代英國霸權的歷史進程而言，中國所需的歷史時程很可能還要半世紀以上的時間。而這也意味著它目前所需要的對外關係結構上應該物質是合作多於衝突。

然而，如果因此說中國的發展軌跡就是雁飛型秩序的簡單重複，則不免將歷史經驗僅僅簡單地作機械性推論。中國至少在兩個關鍵點上不同於先前雁飛型階層中的半主權國家（semi-sovereign states）。¹⁴首先，中國佔有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它的經濟持續成長直接牽動全世界的資源重分配，因此中國的持續成長必然結構性地影響了美國的全球地位。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深深地依賴由核心國家所控制的世界經濟，但是中國並不依賴於美國的安全保護傘，恰恰相反地，戰後中國的國防體系深植著反（美）帝的意識型態。因此，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支撐遠比日本與四小龍更大的政治、外交與軍事上的自主性，也就是對美國的東亞霸權構成更直接的政治對立與軍事威脅之可能性。

物質力量的現實差距與政治軍事上的獨立自主因此形成目前中國對美國東亞霸權一個具有張力的動態平衡。而台灣不管是在資金、科技或地緣軍事上都在這個平衡中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兩岸關係因此成為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兩種力量對比的一個敏感性指標，而台灣長遠的對中關係也應該放在這樣一個世界史的位置上才能得到較清楚的理解。

¹³核心國家在此指的是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盧森堡、荷蘭、挪威、瑞典、瑞士、英國、前西德、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

¹⁴ Pempel 用「半主權國家」來描述東亞雁飛型階層中的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具備一個主權國家的各種要件，然而因為單方面依賴於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使得它們在外交上只能配合美國所設定的目標來運作（Pempel 1997）。

陸、參考文獻

- 大前研一，2003，《中華聯邦》。台北：商周。
- 世界銀行，2003，《中國：推動公平的經濟成長》。北京：清華大學。
- 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Arrighi, Giovanni 著，1999，《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胡鞍鋼，2002，《中國戰略構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陸學藝主編，2004，《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童振源，2004，〈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挑戰〉。頁 31-73，收錄於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臺北：時報。
- 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陸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1-46。
- 顧長永，2000，《臺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互賴發展的順境與逆境》。臺北：風雲論壇。
-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Verso.
-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1997, "The Rise of 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lanning Workshop held at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December 6-7, 1996.
- Baranson, Jack, 1980, *Sources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y*. Washington D.C.: Developing World Industry & Technology, Inc.
- Borden, William S., 1984,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oruss, Michael, 2000, "The Resurgence of US electronics: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Wintelism." Pp.57-79 in Boruss, Michael., Dieter Ernst and Stephan Haggard. 2000.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Rivalry or Riches*. New York: Routledge.
- Cumings, Bruce, 1987,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 Pp. 44-83 in Frederick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ruce, 1997, "Japan and Northeast Asia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136-168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rick, Jason and Kenneth L. Kraemer, 1998, *Asia's Computer Challe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irbank, John King (ed.), 196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Feuerwerker, Albert, 1983, "Economic Trends, 1912-49." Pp. in John K. Fairbank (ed.) 198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 China 1912-1949,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頁 32-14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wynne, Robert N. and Cristobal Kay, 1999, *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Arnold.
- Hamashita, Takeshi, 1997, "The Intra-regional System In East Asia in Modern Times." Pp. 113-135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avi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t, Paul and Grahame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ojima, Kiyoshi, 1986, "Japanese-Styl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4 (Spring).
- Kwan, C. H., 1994,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ward a Yen Block*. New York: Routledge.
- Lardy, Nicholas R., 2002,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ardy, Nicholas R., 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ardy, Nicholas R., 1987,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in Den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 154-19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Ma, Jun, 2000,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1990s*. New York: Macmillan.
- McMichael, Philip, 2000,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 2nd e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Nanto, Dick K. and Radha Sinha, 2000, *China's Emergence as a Major Economic Power: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November.
- Naughton, Barry,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hmae, Kenichi,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 Palat, Ravi, 2001, "Barbarians at the Gate? Restructuring Asia's Pacific Rim after the Crash of 1997-1998."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XXXVI, No 48, December 1.
- Palat, Ravi, 2002, "Labo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ngue Duree*." Paper presented in XII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2-26 July,

- 2002.
- Pempel, T. J, 1999 “Regional Ups, Regional Downs.” Pp. 62-78 in T. J. Pempel, (ed.)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s, Dwight H, 1991, “China’s 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MacFaquhar, Roderick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198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建朗等譯，1991，《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 543-6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Perkins, Dwight H, 1990,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Reforms on China’s Urbanization.” Pp. 78-106 in R. Yin-Wang Kwok, William L. Parish, and Anthony Gar-On Yeh with Xu Xueqiang (eds.) 1990. *Chinese Urban Reform: What Model Now?* New York: M. E. Sharpe.
- Prasad, Eswar (ed.), 2004, *China’s Growth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 Rapley, John, 1996,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avid L.,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lden, Mark,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
- Shirk, Susan L,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4,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 Alvin Y. and Stephen W. K. Chiu, 1995,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
- Tsai, Hung-Jeng, 2003,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ostwar Taiwan-China Rel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t Politic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New York.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ng, Gungwu,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Shaoguang and Hu, Angang,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aiwan*. New York: M.E. Sharpe.
- Walters, Robert S. and David H. Blake, 1992,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Wei, Yehua Dennis, 2000,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Xu, Dianqing, 2001, “China: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ese Economy.” Pp. 47-99 in Tzong-shian

Yu and Dianqing Xu (eds.) 2001. *From Crisis to Recovery: East Asia Rising Again?* 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